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3

思想卷

严绍盦 源了圆主编

策 划:张宪章
特约编辑:何梦祥
责任编辑:张宪章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谷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思想卷
严绍璿 源了圆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5 字数 33.4 万 印数 1—2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296-7/G·323 定价:29.00 元

本书系由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国大修馆书店共同出版
中国版(中文)的专有出版版权归浙江人民出版社所有
日本版(日文)的专有出版版权归大修馆书店所有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编辑委员会

中国方面

主编 周一良

副主编 严绍璦 王勇

编委 (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

马兴国 王 勇 王晓秋 李廷举

刘俊文 严绍璦 杨曾文 周一良

日本方面

主编 中西进

编委 (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

上原昭一 大庭修 中西进 吉田忠

池田温 宫田登 源了圆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思想卷

主编 严绍璁 源了圆

著者(以按撰写章次为序)

- 王家骅 序论: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儒学
- 吉野裕子 第二章 《易》、“五行”与日本神话(刘萍译)
- 严绍璁 第三章 日本古代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第五章 五山汉文学与五山新儒学
第六章 日本近世的儒学
- 神田秀夫 第三章附 芭蕉思想中《庄子》的影响(林祁译)
- 刘萍 第四章 中国的阴阳学说与日本的古代文化
- 田尻祐一郎 第七章 日本对宋明学的受容与变容(杨洪鉴译)
- 古川治 第八章 中江藤树与中国思想(刘萍译)
- 荻生茂博 第九章 幕末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与明清思想史(贺雷译)
- 前田勉 第十章 近世日本对中国兵家思想的受容与变容(刘萍译)
- 郭连友 第十一章 《孟子》思想在日本
- 源了圆 第十二章 幕末日本通过中国对“西洋”的

学习(张建立译)

山室信一 第十三章 清末知识分子的东西学观(杨洪
鉴译)

高增杰 第十四章 学习西方的比较:严复与福泽谕
吉的国民观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

周一良

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大修馆书店合作,分别用中文日文出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我谬蒙推为中方主编,虽曾参与擘画,而年来精力就衰,势难始终克尽主编之责。但是,对这套书仍觉有必要谈一点感想。

首先,这套书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学术界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意图。每卷都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写,各自从不同侧面阐述本卷主题。用这种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写文化交流史,恐怕还是本书首创。各个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或互有联系,或各自独立,其间并不要求整齐划一,而是百花齐放,起交流作用。书名交流史,首先在写作方式本身就贯穿了标题的精神。而且,由于两国学者分别执笔,各自掌握充分资料,因而更利于贯彻本书宗旨——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再从撰写方式来说,本书执笔人有学界耆宿,有史坛新秀,而更多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用我国说法,叫作老中青三

结合,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合作。

其次,本书内容涵盖面比较广阔,计分十个方面:历史、法制、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科技、典籍、人物,不愧大系之称。有些部分,在一般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如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某些部分通常交流史中较少提到,如法律、科技。至于民俗与典籍这两个部门,自来此类著作中更是绝少涉及。由这十个门类,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久,方面之广,相互影响之深,相互关系之密,世界上几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于比拟。

本书试图用浅近笔调表达学术性内容。各卷包含的专题大都为作者研究所得,但为保持各卷主题的体系,作者大抵采用点面结合办法,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面上亦有必要的相应的叙述。因此,本书既可供专业人员参考,也适于一般读者阅读,此感想之三也。

是为序。

1994年9月15日写于北大燕东园

目 录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序..... 周一良(1)

序论: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 (1)

第一编 中日古代思想关系总论 (23)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儒学 (25)

(一)关于儒学之传入日本 (25)

(二)所谓日本早期儒学 (28)

(三)日本早期儒学的特征 (30)

(四)日本早期儒学的衰落 (53)

第二章 《易》、“五行”与日本神话..... (58)

(一)《易》与“五行”概要 (58)

(二)关于天津神、国津神的构成产生于《易》理的
推论 (68)

(三)关于彦火火出见命神话产生于“五行”法则的
推论 (78)

(四)结语 (83)

第三章 日本古代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85)

(一)中日古文化中的“神道观” (86)

(二)《日本书纪》中的“尊”与《道藏》中的“天尊”	(88)
(三)“天皇”的定格与道家文化	(89)
(四)日本古代皇室的“神器信仰”与“祝紫为上”	(93)
(五)10 世纪日本宫廷的“咒文”	(96)
(六)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文学中的道家思想	(97)
附：芭蕉思想中《庄子》的影响	(101)
第四章 中国的阴阳学说与日本的古代文化	(115)
(一)《易》的东传	(116)
(二)日本古代政治中的阴阳道学说	(117)
(三)日本传统民俗中的阴阳道	(124)
第二编 宋明学术的东传	(131)
第五章 五山汉文学与五山新儒学	(135)
(一)五山文化的范畴	(136)
(二)五山汉文学	(141)
(三)五山僧侣“儒佛互补”的理念	(148)
(四)宋学的东传	(155)
(五)新儒学的确立	(163)
(六)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172)
第六章 日本近世的儒学	(176)
(一)林罗山与朱子学派	(177)
(二)中江藤树与阳明学派	(191)
(三)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与古学派	(203)
第七章 日本对宋明学的受容与变容	
——以孝为视点的考察	(221)
(一)朱子学与阳明学关于“孝”的理论	(222)

(二)日本朱子学派的孝道观·····	(230)
(三)日本阳明学派的孝道观·····	(236)
(四)结语·····	(247)
第八章 中江藤树与中国思想·····	(250)
(一)对中国思想的吸收与创造·····	(250)
(二)藤树学的普遍性与现实意义·····	(265)
第九章 幕末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与明清思想史·····	(268)
(一)幕末阳明学与大盐中斋·····	(270)
(二)大盐中斋对明清思想史的批评·····	(275)
(三)明清思想史中的阳明学·····	(281)
(四)清末思想界对幕末阳明学的理解·····	(292)
(五)结语:关于三个问题的辨正 ·····	(298)
第三编 近代转型期的中日思想交流·····	(303)
第十章 近世日本对中国兵家思想的受容与变容·····	(305)
——以明代兵家思想为中心	
(一)军事国家与兵学·····	(305)
(二)陆军——戚继光统兵术的受容问题·····	(310)
(三)海军——明代海防论的受容问题·····	(319)
(四)西洋的冲击·····	(326)
第十一章 《孟子》思想在日本	
——《孟子》与吉田松阴的“革命思想”·····	(328)
(一)引言:《孟子》在中日两国的命运 ·····	(328)
(二)日本和中国的吉田松阴研究·····	(336)
(三)《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与吉田松阴“革命思想”的形成 ·····	(343)

(四)吉田松阴“革命思想”的特色·····	(355)
(五)结语·····	(365)
第十二章 幕末日本通过中国对“西洋”的学习	
——以接受《海国图志》为中心·····	(368)
(一)本课题研究的现状·····	(368)
(二)魏源和《海国图志》·····	(372)
(三)《海国图志》的东传日本·····	(379)
(四)幕末日本对《海国图志》的受容与思考·····	(383)
第十三章 清末知识分子的东西学观·····	(400)
(一)接受西学的逻辑结构与中学的位置·····	(401)
(二)中学的革新与西学的汲取·····	(406)
(三)“模范国论”与变法维新运动·····	(412)
(四)东学——立宪与革命的法门·····	(418)
(五)结语·····	(423)
第十四章 学习西方的比较：严复与福泽谕吉的	
国民观·····	(426)
(一)重视“国民”——国之“本”·····	(426)
(二)国民观——关于国民地位的认识·····	(431)
(三)改造国民方案所表达的“国民观”·····	(441)
(四)小结·····	(448)
中文版编后附志·····	(450)

序论：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

（一）

中日两国的思想交流已有漫长的历史。据日本的《古事记》（成书于 712 年）和《日本书纪》（成书于 720 年）记载，百济人王仁曾于应神天皇十六年（约相当于公元 405 年）将中国典籍携入日本，其中就有《论语》10 卷。从此便开启了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两国思想交流史。然而，在中国开始进行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却是在晚近 20 世纪初的事。1905 年 1 月出版的《国粹学报》12 期发表了题为《朱张二先生传》的文章（著者荀任），介绍了在中日思想交流史上曾发挥重大作用的朱舜水（1600—1682 年）和张斐的事迹。此后，便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发表过为数不多的有关中日思想交流史的著作和论文。其中较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1936 年）和梁盛志（容若）的《汉学东渐丛考》（1946 年）。前者虽如评者所云“实有疏失”，“详于纪行，而略于记学”，但仍不失为梁启超“著述年谱之示范”。^①而后者则“谈

^① 梁容若语。详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23 页。

戴笠,论陈元赟,都把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确实有所发现。^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研究中日思想交流史的学者,仍寥寥可数,集中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但其研究成果却有蔚为可观者。如中国的日本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朱谦之(1899—1972年)的专著《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和《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即是其代表。这三部书,虽系日本哲学思想史专著,但其中不少内容涉及中日思想交流。此外,他还于1961—1962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以“中外思想交流史话”为副题的几篇文章,如《李贽与吉田松阴》(1961年8月13日)、《吴廷翰与伊藤仁斋》(1961年9月8日)、《朱舜水与日本》(1961年12月5日)、《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1962年4月1日)等。遗憾的是,这一良好势头被“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打断了。

(二)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重现生机,并由开创期进入初步繁荣期。严绍璁的《中日禅僧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中国哲学》第3辑,1980年),可谓鹤鸣第一声。严文异于此前通说,认为“在十四世纪,即德川幕府之前两个世纪,日

^① 汪向荣语。详见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421页。戴笠(曼公)和陈元赟均为明末清初亡命日本的中国学者。

本统治阶级已经把宋学作为一种理想的统治思想”。随后，孙方柱著文《宋学成为日本的统治思想是在十四世纪吗？》（《中国哲学》第8辑，1982年）与之商榷，仍坚持学界的一般见解，主张“宋学，主要是朱子学，在日本真正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在17世纪德川幕府时代”。这一论争虽未能继续深入展开，但它预示了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的初步繁荣期即将来临。

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的初步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数量增多。

中日思想交流史的研究，主要是由哲学工作者和历史学工作者进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历史系、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室、日本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哲学系）、辽宁大学（哲学系、日本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系、日本研究所）、延边大学（哲学系、朝鲜研究所）、山东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室）、青岛大学（社会科学部、日本研究中心）、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武汉大学（哲学系）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仅有近百名学者从事有关日本思想史和日本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还大都设置了硕士课程，培养专攻日本哲学史或日本思想史的年轻研究者。其中，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研究室，自1985年起便开始设置日本思想史博士课程，并已培养出三名专攻中日思想交流史的博士。自1995年起，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也开始设置专攻日本哲学史的博士课程。

第二，学会活动日趋活跃。

1980年，成立了日本史学会，以后其下设置了日本思想史、文化史专业委员会。1981年，成立了中华日本哲学会。以这些学

会为中心,举行了多次有关中日思想交流史的学术讨论会,如“河上肇纪念学术讨论会”(1986年)、“西周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等。有的学术讨论会,还是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举办的,如“中日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山东大学主办,日本的安藤昌益会与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后援)。有不少日本学者参加了这些学术讨论会。

第三,国际学术交流日渐频繁。

“文化大革命”后,打破学术“锁国”状态,不仅有许多著名的日本学者访问我国,还有美、韩等国的一些学者来访,进行讲学、报告,与我国学者就中日思想交流史的重大问题展开学术交流。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到日本访问,参加学术会议、研修或讲学。有的还在日本出版专著或发表论文,扩大了国际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年轻学人,到日本留学,专攻中日思想交流史。有的已在日本获得硕士乃至博士学位。

第四,研究成果显著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1995年,已发表有关中日思想交流史的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有的是在日本发表的,有的在國內发表后被译为日文,还有的在港台地区以繁体字出版或再版。

(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的初步繁荣,更主要地表现为研究的深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方法的更新。一些论著发前人或外国人之所未发,逐渐形成中国的中日思想史研究的

独特风格。

1. 总体把握的新尝试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多为通史性的概述，或关于少数几个人物的考证文章。如前述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以及梁容若有关李竹隐、朱舜水、陈元赟、戴笠、隐元隆琦的论考等。它们虽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但仍有待深化。

1989 年出版了王守华、卞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它虽也是一部通史性著作，且博采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继承了先辈学者朱谦之前述著作和刘及辰的《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和《京都学派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的研究成果，但它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尚属首例。在中日思想交流史方面，该书的论述也多有超越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之处。如它对日本神道哲学的论述便更加强调了“学派神道主要是受中国佛教、儒学、道教及其他思想影响，与神道结合的产物”（该书第 140 页）。而且该书在日本哲学史的特点的总体把握上，也更加明确了与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关系。它认为日本哲学史具有①移植的特点，②融合、创造的特点，③中间类型的特点。即“在古代主要是移植中国哲学而具有东方哲学的特点，从近代开始又移植欧洲哲学而具有西方哲学的特征，最终融合东西方哲学思想形成既具东方哲学特点，又具西方哲学特点的日本型哲学”（该书第 8 页）。该书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较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前进了一大步，是学习日本哲学史和中日思想交流史的良好教材。

1994 年出版了王中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